

10.13

文史资料辑存



第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编 辑 说 明

一、本辑存刊印的目的，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，供编写地方史、志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，并推动文史工作的开展。所收资料，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因此，本辑存只在内部发行。

二、本辑存所收资料的期限是，上起清末，下止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。凡属这一时期有关常熟地区的自然、社会、人文等方面的资料，不论体裁，均所欢迎。

三、本辑存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择、摘录、删节或作结构上的调整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四、来稿凡经选刊，略致薄酬。

五、欢迎所有读者，对本辑存所载资料，提出补充、订正或质疑；对编辑工作，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文史资料辑存第十辑

目 录

-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常熟的工作……………钱伯荪 (1)
- 关于东路财经工作的点滴回忆……………任天怀 (11)
- 我在反清乡斗争中的经历……………王瑞龙 (23)
- 艰苦奋斗的东路后方医院……………费介成 (31)
- 新四军后方医院人事一览……………王 璘 (37)
- 敌后水上印刷厂……………吴以常 (38)
- 狱中漫记……………沈雪侠 (49)
- 王永德三兄弟……………王琳元 (64)
- 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完璧记……………赵苑香 (68)
- 解放前江苏省立常熟中学概况……………单树模 (74)
- 我县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物考释……………黄步青、廖志豪 (84)
- 奇士沈北山……………陆孟笑、何 泉 (93)
- 回忆常熟助育员训练班……………张文华 (101)
- 常熟绸布行业简史……………顾鸿希整理 (103)
- 常熟印刷业七十年……………仲虞生、汪青萍 (121)
- 常熟报刊史补遗
- 为国民党派系斗争所利用的三种报纸…顾式璠 (130)
- ✓ 略谈常熟地方志书目……………沈传甲 (132)
- ✓ 编纂《唐市志》始末记……………嵇振飞 (143)

虞山琴川话常熟.....	阮仪三(145)
王四酒家.....	王继琴(148)
重修兴福寺记.....	羽佳(155)
虞山风光纵横观.....	本会根据园林管理处 等单位供稿整理(157)
辛亥革命以后至解放前夕常熟县长姓名一览表...	庞士龙(180)
沦陷时期的国民党“常熟县政府”	季铁城(183)

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常熟的工作

钱 伯 荪

一、从苏中区党委到“苏、常、太”工委：

1944年冬，我在华中党校学习后回到了苏中区党委。一地委通知我，要我回去筹建专区法院。我在招待所与六地委书记钱敏同志住在一起，他要我去江南工作。我接受了钱敏同志的意见，经区党委批准，便转往六地委报到。

六地委辖苏常太、澄锡虞及太湖地区，地委机关设在苏北靖江境内的黄家埭。临去六地委报到时，一地委要我将总务科一位江南同志肖顺顺带回江南，把我原来的通讯员留了下来。

二、会见任天石同志：

我到六地委，便见到了任天石同志，当时他任六地委常委、专区专员。初次见面给我印象十分深刻。他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待人诚恳。他要我去江南建立常熟抗日民主政权，在群众中建立不脱产的秘密的新四军小组（即民兵）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县政府不建立任何下属机构，由县长带了印信，进行活动；宣传和争取敌伪军队官兵；征收粮、税。苏常太工委下面不设县委，由工委委员领导各县工作。苏常太工委由杨增、陈刚和我三人组成，杨为书记，我任工委委员兼常熟县长。不久，江南便派陆根兴同志雇船来接我和肖顺顺渡江，两

天后才到达高浦口，在碧溪附近见到了杨增、陈刚和浦太福（太仓县县长）等同志。我与杨、陈、浦三位同志是初次见面。当晚传达了地委指示。苏常太工委除三名委员外，尚有秘书钱宏、医生吴洪海，另有一警卫员姓杨。

三、“苏、常、太”地区的形势：

“苏常太”是日伪在1941年“清乡”后重点控制的地区。自我军北撤以后，国民党的“忠救”军乘虚而入，与日伪“和平共处”，并勾结了地方恶霸，专事反共勾当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日伪还在常熟各乡征军米，砍军树，收捐税，实行所谓“以战养战”。并在我活动地区梅李、董浜、吴市、徐市、何市、支塘、东唐市、白茆、横泾、古里、兴隆、珍门、浒浦、沈市、王市、福山、谢桥等地设立据点。福山塘的两侧为“忠救”包汉生盘踞的地区，阳澄湖一带又为胡肇汉占领。这样，我方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，活动地区狭小，环境恶劣。我们的武装力量当时还比较薄弱，白天分散出去进行群众工作，晚上集中移动，寻找宿营地。我们的武工队员中除极少一部分是由外地（四分区）调来的以外，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同志。因此，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，群众待我们亲如家人。我们吃的粮食，开支的费用，向群众征收每亩白米一升的公粮，全由群众主动供给。除此之外，不收其他税捐。

四、常熟县武工队活动范围：

常熟武工队当时的活动地区大致如下：吴淞区、支塘区、东唐区、古沈区、梅南区、梅北区。各区负责同志记得的有：吴淞区包昆林，古沈、东唐区徐政、朱英，梅南区赵权之（陆天虹），梅北区徐林生、吴鹤、杨金奎等。工委分工如下：杨

增率工委机关活动于吴淞、梅南等区，陈刚和我活动于梅北、梅南等区，徐政、朱英活动于支塘、白茆、东唐市、古里一线。

五、关于“一二一”工作：

“一二一”工作就是把伪顽的基层政权力量，主要是乡保长，从为敌伪工作，变成也替我们做些工作的两面派，然后教育、争取其中表现较好的人成为主要替我方工作，敷衍“敌、伪、顽”的“白皮红心”人物。当时每个区有一半以上的乡，基本上为我方控制。如梅北区大部分乡即为我方控制。我们的活动范围北可到达福山、邓市，南到毛家桥以南，最远处可见常熟城墙，西至福山塘，东至梅李塘一带。在边沿地区的乡政权基本上做到为两面服务，不敢反动。在与“忠救”军接壤地区的乡保长，虽与国民党有关系，但基本上不敢公开反对我们，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不得不接受我们的一些要求，在敌伪税捐中截留部分款项交给我方。因此，我们武工队的经费，完全可以自给。

六、寻找清乡前的地方党员：

在反清乡斗争中，“苏常太”地区的基层党员和地方干部损失极大，整个常熟的党组织，完全停止活动。我们回到江南后，只在“古沈区”古里村以北找到一个未被破坏的农民党员小组。这个小组共六、七人，清乡后虽与党失去了关系，但他们在小组范围内保持了联系。武工队发现了这一个小组，经过审查，经工委批准，承认了这个组织，由赵权之同志领导。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间，工委指定我去和他们开过一次会。这个小组同志的姓名已经记不得了。解放后任森泉乡长的高永男

和高明宝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。

七、敌伪军工作：

对我们活动地区里据点的伪军，主要采取宣传、教育、结合一些突然袭击等方式，进行分化、瓦解和争取。如王市的伪保安队，接受我方控制后，就不再下乡骚扰，在据点内也不敢为非作歹。梅李、福山的伪军，也不敢单独下乡活动。常熟伪保安队队长仲炳炎曾派他的副官曹鸿元来联络，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前来投诚。虽然仲炳炎并不是真心，但也说明了我们分化瓦解伪军工作是有成绩的。常熟特高课课长王平（秦汝棠）慑于我方武装力量，非但不敢公开破坏我们，还派其爪牙情报员苏某来见陈刚同志，表示愿意将功赎罪，不在我方地区搞情报。

八、城市地下党：

反清乡斗争中，城乡基层党组织遭到了破坏。以后精兵简政，部分党员精简回城市隐蔽。“苏常太”工委成立后，这些同志经上级通知，均由工委负责联系。我负责联系的有常熟城内张冠芳（陆易），还有非党同志叶佩兰等。在昆山城内，有一个直属工委领导的党小组，共有三名党员：徐英（吴枫声的妻子，后脱党），蔡心泉（裁缝），王志勤（其父在朝阳门开小旅馆）。因小组内有些意见，不团结，工委要我召集他们来乡开会，进行教育，布置任务。他们在森泉附近住了三天，并补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

九、钱湾战斗经过：

1945年5月，阴历端午节前，我率领梅北武工队（队长杨金奎）越过福山塘进入忠救控制地区，在归家城、钱家大宅

基、小义桥一带进行宣传活动。第四天晚上流动到钱湾村宿营。住地人家有兄弟两人，其中一人拜“忠救”小头目为“先生”，半夜以后，潜往顾乡长家中报告，顾乡长又报告了“忠救”，“忠救”不敢单独前来，又去报告了伪保安队和日寇。拂晓，敌、伪、顽同时出动，向我驻地围攻。我们用密集的手榴弹向正面之敌猛烈冲击，敌向长田岸溃逃。我们冲出包围后，撤至归家城北的小村上休息，这时埋伏钱湾以西之敌正由归家城集结向钱湾进击。因为我们人数太少，又无机枪，所以未与敌人开火，直至下午四时许，我们始经毛家桥向东撤走，安全到达汤家桥附近宿营。这次出动的敌人，估计有二百余人。

十、令伪县长送还拎包：

钱湾战斗后，回到宿营地，发现我的拎包，由于肖顺顺惊慌失措，丢失在路边水田里。我们估计此包已被敌人捡去。包是用布做的，内装牙刷毛巾印信纸笔等物。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伪县长王昆山，限令他将原包送回，否则要对他进行惩罚。信是在梅李邮寄的。王昆山虽然是个老奸巨猾、死心塌地的汉奸，这时他已预感末日将临，过了三四天，他派县保安队副官曹鸿元将包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。不久，伪常熟日报却登载新闻，说“已将钱伯荪击毙”云云。

十一、许家溇遭敌搜索：

许家溇在周行境内，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。钱湾战斗后一个多月，我去周行会晤陈刚同志。我抵周行后，当晚带通讯员吴二宿营在许家溇许老太家中。第二天天亮后派吴二去陈刚同志处联系。吴二走出村子半条田埂，即见大批日军由北向南

而来。他立即折回报告。自钱湾战斗后，日军对伪军已不太信任，这次不用伪军，进村后就直冲许老太家中，查问钱县长在哪里？许老太很沉着，当即回答：不认得钱县长，从未有人来过。这时，我和吴二已在宅前上了小船划出村外，日寇找不到一丝踪迹，一直等到傍晚才撤走。从这一事件，可见敌人的情报相当准确。这次究竟是谁告密的，我们当时没有弄清，以后工作忙了，也没有再去查问。

十二、遭敌伏击，安全突围：

巢湖帮海匪夏得海，有徒众七、八十人，在长江下游及黄海南部横行，抢劫商旅，危害人民，后经汪伪收编成为一支在水上破坏我们的反共部队。一天，夏得海带了部下从常熟城里出来，要在吴淞区下海，被我工委侦悉。工委书记杨增同志下令将各区武工队集中吴淞区，准备剿灭这股海匪。但当部队集中时，夏已下海而去，而日寇却集中了数百兵力，在东起吴市西至浒浦、梅李，南沿珍门庙、沈家市的一带，实行封锁，企图将我武工队包围后一网打尽。由于我方获得情报确切，在敌人尚未到达之前，即于夜间越过梅李到达董浜，跳出包围圈。这次敌人在吴淞区布防三天，又集中兵力在区内扫荡，因我方早已撤出，一无所获。仅我武工队有一个同志撤出时因公未归，翌晨拂晓回来渡河时，被敌伏兵俘去。这个同志遭到严刑毒打，始终没有泄露军情，后遭杀害。现葬浒浦烈士墓地。

十三、擒获海匪夏得海：

夏匪投敌以后经常出入常熟。有一次从常熟往浒浦，被我侦悉，即派武工队在陈塘桥埋伏守候。夏匪偕其妻子身背短枪，大摇大摆从常熟过来，当即被我方擒获。那时杨增同志和

我住在沈家市附近。我们考虑杀他一个夏得海没有多大的影响。而他手下的七、八十人枪仍在海上作恶，倒不如采取政策攻心，放他回去，约束部下，改邪归正。我们对他除缴掉武器外，不用武装看守，并另外找一个房间让他们夫妇两人居住。每天由我与他谈话，进行政策教育。三天后宣布无条件释放，发还他的枪枝、钱款，又送他手枪子弹数发，派人送至梅李附近。他临走时感激万分，表示要改邪归正，而且还要带他的部队，前来投诚。夏得海是一个亡命之徒，但还很讲江湖信义，去后不到半月，果然带领船只及步枪四十余支、短枪几支来高浦口向我工委投诚。后来，任天石同志派朱英同志去带领这支部队。北撤之后，夏得海部曾在长江中截住国民党军粮一船，缴获白米数百石、面粉数百包。夏得海曾去江海公学学习过，由于过不了艰苦生活，要求复员，经上级批准回巢县老家务农，临走时一再表明，以后决不再做坏事。夏得海回家后确实种田过活，并积极参加民兵活动，大军渡江南下时，担任民工分队长，在福建前线立了功。一九四九年十月民工复员，他特地来常熟看望过我。

十四、去苏北请示：

日寇宣布投降以后，由于我们没有电台，得不到上级及时的指示。当时城里伪军已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，日寇公然宣布为国民党防守常熟城，伪县长王昆山也宣布为国民党维持常熟秩序，静候国民党接收。我们没有上级指示，不能作出决策，工委决定由我带武工队一个班去苏北靖江黄家埭，向地委请示。

我向钱敏、任天石同志汇报江南情况后，地委认为在上级没有指示前，江南仍应坚持游击状态。并由任天石同志先来江

南，代表地委具体领导。第二天我和天石同志乘原船返回江南，我们先去十一圩港沙洲县境内会见了沙洲县委书记沙金同志，并抽调武工队员五、六十人，分乘民船五艘，沿江东下，在先生桥进港靠岸。

十五、护送朝鲜同志去上海：

日寇投降后，中央决定遣送在我部队里工作的朝鲜同志，作为遣俘经上海回国，参加朝鲜革命队伍。在苏中工作的朝鲜同志有一部分是经过启东从常熟走的，由工委负责接送。我们共护送过两批，人数不多，只几个人，但均安全完成了护送任务。这个工作，当时是保密的。

十六、成立苏常太独立团：

日寇投降以后，苏中区党委对苏南地区工作经过反复研究，决定不派大兵团南下，由本地区自力更生坚持斗争。但为了支援我们，由东南警卫团派一个连（五连）由启东渡江，到达常熟高浦口，去吴市与我部会师。五连到达吴市后，随即开往徐市休整，两支部队合编为一个独立团，陈刚同志任团长，任天石同志任政委。由东南警卫团来的一位姓唐的同志任参谋长。“苏常太”独立团在梅李正式宣布成立。

十七、成立苏常昆太行署：

为了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行政工作，六地委决定成立苏常昆太行署，任命我为行署主任兼常熟县长，浦太福同志为副主任兼太仓县长，各县工作仍由县长负责。行署随常熟县政府一起活动。苏常昆太行署和常熟县政府至一九四五年底北撤后同时撤销。

十八、协助浙东四明山部队北撤：

浙江四明山区是江南八个解放区之一。双十协定后，四明山部队奉党中央命令撤往苏北。中央指定其行军路线，从海道至金山卫登陆，然后取道青浦地区，经常熟浒浦、福山渡江北上。常熟的任务是准备粮食、船只及向导人员。部队经青浦至昆山越过铁路进入常熟境内，在梅李休息后，即分批从浒浦渡江至海门，到达苏中地区。这次部队过境，给常熟地区群众带来了很大鼓舞。反清乡斗争以来，群众还未见过我方如此众多且军容威武雄壮的部队。

十九、建立区委及区人民政府：

苏常昆太行署成立之后，地委决定在各县正式成立区委和区人民政府，委派区委书记和区长。当时常熟有梅北、梅南、古沈、吴浒、支塘、任石、东唐等区。

二十、璜泾战斗：

常太交界的璜泾镇驻有伪军，是个较大的敌据点。抗战胜利后，伪军仍死守顽抗。一九四五年十月，任天石同志决定将这据点拔除。我部分三路由太仓武工队配合向璜泾进攻。第二天守敌即仓惶北逃，我进驻后，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。是役因侦察疏忽，敌在典当楼上设机枪一挺，封锁了我向西进击的通道。我独立团一连连长和副政指（启东人），以及战士数人牺牲。伤员撤下后，在吴浒区成立临时医务所，由仲国銓同志和吴医生负责治疗。

二十一、兴隆桥战斗：

兴隆桥离城很近，是敌伪顽常熟的前哨据点。我梅北区区区长周一航同志率武工队向该据点守敌进攻，但因我方兵力太少，未能攻占。当我方撤出战斗后，守敌迅速向常熟逃窜。战斗中，周一航同志腿部负伤。

二十二、动员参军和征集粮食：

在北撤之前，我们曾进行一次动员参军参干和征集粮食工作。以各区委为核心，动员骨干力量，进行广泛宣传之后，即行开征，群众热烈赞助，不到半月全部征完，共收到白米五百多石。参军参干青年约有三百人，分批编入独立团，部分知识青年送往苏中公学。独立团和新兵由沙金同志率领编入主力。

二十三、北撤待命：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，六地委决定除陈刚、徐政、朱文斌、吴鹤、徐林生、顾政、潘新等同志外，均撤往苏北待命。第一批北撤的是任天石同志带的独立团，第二批是朱英同志带的夏得海部及原常熟武工队部分同志，最后一批是我和杨增同志及常熟城里撤下来的部分党员和知识青年。我们还带了二百多石白米。行经苏北如皋马塘，大船重载不能西行，经请示上级后将这批白米交给了如皋县政府。

我们到达地委后即迁往如皋城。六地委撤销，钱敏、杨增和我调往苏中区党委。以后我即重返启东，建立启东县人民政府。

关于东路财经工作的点滴回忆

任 天 怀

一、塘桥自卫队的经费筹措

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，原“中国民族武装抗日自卫会常熟分会”的一些同志如李建模、陈刚、华玉鼎、顾鉴修、任天石等于梅李、浒浦、塘桥等处，组织抗敌后援会。同年八月十三日，沪战爆发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更趋活跃。十一月间，日寇从常熟、太仓的七丫、杨林、野猫口等处登陆，常熟沦陷。沦陷后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是散兵游勇，盗匪如毛。地痞流氓勾结盗匪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敲榨勒索，无恶不作。社会秩序混乱不堪，真是暗无天日，民不聊生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任天石等在塘桥以保家乡为号召，在原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，组织当地的一部分青年成立了自卫队。自卫队的成员是不脱产的农民、镇上的店员，以及附近小布厂的职工等。他们白天生产劳动，晚上集中巡逻放哨。自卫队建立后，确实起到了防范盗匪骚扰、保卫家乡的作用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赞扬。

当时自卫队的支出主要是购买枪枝弹药。这些枪枝弹药都是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散落下来的。除了一部分是由当地农民群众捞到后送给自卫队的以外，一部分是出钱买的。起初一支步枪花1~2元，后来要花5~10元。自卫队员晚上巡逻放哨后

也要支付一些夜餐费用。另外，还要支付一些其它杂支，如有一次驱赶土匪时，误伤一个被土匪拉去摇船的农民，支付了一些处理后事费用。

自卫队经费的来源，起初是在“打东洋，保家乡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的口号下，向某些殷实户“劝募”的。由于任天石在当地有一定威信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，开始也劝募到一些钱，但毕竟数量有限。最多的户头如陶沙乡原乡长高××经数次“劝募”，也不过拿出了近百元之数。以后，自卫队增加了半脱产人员，再加上要买枪枝弹药，支出日渐增加，虽一度扩展到向过路商船（主要是贩粮船）劝募，但数量甚微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以塘桥自卫队成员为主，举办军事训练班，集中进行军事训练。因有近百人训练，生活费用与给养的需要更加紧张，因而我们提出要有依据有条件地更广泛地开展“劝募”，向地主收些田赋（实际上还是“劝募”的又一种形式与说法而已）。由于在当时自卫队控制区梅塘两岸的几个小乡里大部是佃农，地主绝大部分住在城里，无法直接向他们征收，因而我们采取了“丘领户”的办法进行，即由土地所在地的佃农代地主缴纳田赋，将来在田租内扣抵。旧政府征收钱粮一年两次（称上芒、下芒），赋额分三等九则。当时我们没有条件搞得这么烦琐，就很简单的提出每年按亩征收四角钱（上芒二角，下芒二角），也没有什么粮串，只是在收到后出一张收据而已。由于我们对贫苦农户实行免征，而征收时各户租种的田亩数也是自报的，因而七折八扣，能收到的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。当时我们控制的地区仅是几个小乡（塘桥、陶沙、雨花、森泉、清水乡等）的一部或大部，实际征收到的还不足二千元。

二、“民抗”成立初期的财经工作

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(简称“民抗”)正式成立。随着队伍的扩大，开支又相应增加。“民抗”经费靠“劝募”已经不能解决问题。当时经费来源的一部分，是通过徐少川的关系从浒浦税卡收入中提取分成得来的。徐少川本人手中并无直接掌握的队伍，但他拜浒浦赵培芳为师，他的徒弟小陆兴、王兴手下有一批武装力量，其所以在“民抗”成立大会上被推为大队长，就在于可利用徐与赵培芳、赵培芝的关系从浒浦税卡中提取分成。其实徐少川从未在大队部生活过。

其时，兵灾之后的农村人民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而城里地主依仗日伪势力，开始派狗腿子下乡催租，再加挂着“抗日”招牌的各色土匪游击队，又在强赊强买，敲榨勒索，农民实已不堪负担。因此，“民抗”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，反对强卖强买的主张。同时，还提出过减租减息的主张，但在民抗控制区，地主不敢来收租，农民也宁可向“民抗”缴田赋，没有再愿向地主缴租米的。

“民抗”提出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，但却与周围那些挂着“抗日”招牌的土匪部队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。如梅李小陆兴要在陶沙乡横泾立码头、收田捐；浒浦的赵培芝等要在梅李、珍门一带立码头、收田捐，还有王市、福山等处的土匪游击队也要在何村、周行桥等处立码头、收田捐，因此，“民抗”与这些横行乡里、鱼肉人民的“游击队”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，遂发生了一九三九年的“一·七”事变，土匪部队勾结汪伪军队从县城、福山、浒浦分三路向“民抗”发动突然袭击。

这一时期的财经工作，与自卫队时期相比已有发展，自卫